2016年6月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June. 2016
第32卷 第6期 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Vol. 32 No. 6

■文化传媒研究

“大一统”视域下的清朝边疆文化
——以桐城桂林方氏家族遣戍宁古塔为例

金卫国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天津 300350）

摘 要：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典型的仕宦诗礼之家，其族人仕途显赫，珍视忠孝节义，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领域成就斐然。明清鼎革之际，方氏族人对清政权多持抵抗及不合作的态度。方氏父子在遣戍途中和遣戍地勤于著述，不仅记录了其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而且留下了当时东北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宝贵记录。他们还与吴兆骞等流人交往唱和，对边疆文化的提升和内地人民了解边疆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解读其诗文，分析其心态，指出其对东北边疆文化的贡献，及对清代“大一统”的实践认知。

关键词：桐城方氏家族；宁古塔；《绝域纪略》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6)06－0001－05

PDF **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6.001

The Borderland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Under “Great Unification”—Taking the Clan of Fang in Tongcheng Exiled to Ningguta as an Example

JIN Wei-guo

(*Tianj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ollege*,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Fangs in Tongcheng is a typical clan of official and schola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s clansmen had illustrious official career, highly valued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hilosophy, natural science, literature and other fields. Fang Gongqian and his sons were exiled to Ningguta on the excuse of the case of Jiangn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n the way to and in Ningguta, they were diligent in writing. Their works recorded not only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spiritual path, but also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social customs in the Northeast. Their responsories with other people exiled like Wu Zhaoqi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frontier cultur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rontier culture by the people in the Hinterland. Through careful study of their poetry and pros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ate of their mentality,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Northeast frontier culture, and their practical recognition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ir own practice.

Key words: Fang clan of Tongcheng; Ningguta; *Brief Records on Borderland*

清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辽阔的疆域随之最终奠定。正如雍正帝所言：“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1]卷83，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 清朝不仅版图辽阔，江山一统，而且对从“华夷之辨”发展为“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有显著的推动①。这既源于清帝的重大理论创新，又与满汉各族的实践认知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认同与民族磨合过程。国家疆域的奠定，加上清廷的政治诉求，使东北边疆地区的流放文人数量大增，有力地提升了边疆文化。桐城桂林方

收稿日期：2015－09－30；**修回日期**：2015－10－23

基金项目：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2805)

作者简介：金卫国，男，河北唐山人，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清代家族史，教育史。

氏家族以其政治命运的坎坷和对边疆文化的重要贡献，成为研究这一历史过程的绝佳标本。学界对清朝东北流人及边疆文化有了较丰富的研究②，但以家族为视角的研究却十分薄弱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方氏族人的诗文笔记为主要史料，紧密联系历史背景，对其做一初步探讨。

一、仕宦诗礼家族明清鼎革之际的分化

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与一个时期的政治及文化密切相关。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典型的仕宦诗礼之家，其发展历程对此做了极好的诠释。

首先，方氏家族是典型的科举家族。其族人从事举业者众多，折桂如林、仕途显赫。及至乾嘉时期，方氏出现方观承、方维甸、方受畴“一门三督”的盛况，清人陈康祺不禁慨叹“桐城方氏仕宦之盛”[2]卷4,78。张杰先生依据朱卷履历的记载，统计出至光绪十五年(1889)，方氏家族有进士27人，举人54人，生员多至数百人。[3]227

其次，方氏家族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十一世方学渐(1540－1615)开方氏治《易》先河，其后人治学研艺，多崇尚实学，形成了深厚的家学。至十四世方以智，四世传《易》，四世研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方氏学派。同时，方氏在经史诗文书画等方面成就斐然，为传统文化的总结发展和中西文化的对接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被誉为“17世纪百科全书式大学者”的方以智，著有《药地炮庄》、《东西均》、《物理小识》、《通雅》等，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方苞戛戛独造“义法”之说”，卓然居桐城派三祖之首；“桐城三诗人”方文、方贞观、方世举饮誉清代诗坛。故此，后人方昌翰列举了自五世方法殉建文之难之后的忠孝贤杰：方文、方中通、方苞、方观承等，并说，方氏“诗书之泽，绵延数百年而未艾”。[4]

此番话洋溢着对自己祖先文化成就的自豪感，也是时人和后人的共识。如清人朱彝尊云：“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5]卷14,425；梁实秋则称：“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6]74

再次，方氏为珍视忠孝节义的家族。自五世方法质疑朱棣即位的合法性而投江殉义开始，其后人追慕其铮铮铁骨者不乏其人。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政权依附至深的方氏家族，在明代中叶以后愈演愈烈的“华夷之辩”的历史氛围下，其族人对清政权多持抵抗及不合作的态度。如方授和方以智的抗清，方文的甘做遗民，即为显例。作家高阳赞曰：“方氏一门，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中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7]49

当然其族人中也有与清廷合作的。如前明官员方拱乾及其长子方孝标、次子方亨咸在清初出仕清朝。珍视气节的方氏家族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呢？

满洲贵族要统治广大的以汉族为主的原明朝地区，显然离不开汉族望族和士人的合作。清廷为维持其统治，一则征用前明官员，一则开科取士，以收扩大统治基础，缓和民族矛盾的双重效果。

在科举的感召下，方亨咸和方孝标分别考中顺治四年和顺治六年进士。清初科举命题中，“满汉一体”、“天下一家”之语比比可见。如顺治六年四月，世祖殿试天下贡士：

> 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8]卷43,顺治六年四月庚子

“满汉曾无异视”之说虽有悖史实，但清廷欲联满汉为一体的殷殷求治之心溢于言表，显然有助于孝标等士人增进对新朝的认同。孝标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兼内翰林弘文院编修、日讲官、经筵讲官。他后来自述：“列宫僚，备讲幄。凡讲无不与，凡赐无不被。‘楼冈’，臣别号也，而先帝尝辱呼之”[9]30，顺治帝甚至说：“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10]卷7,100。君臣关系之亲密，于此可见一斑。惩于多尔衮专权，顺治帝亲政后，急于乾纲独断。为抗衡满族权贵，增加统治经验，顺治帝的目光投向汉官和汉文化。孝标言行谨慎，才华突出，遂受皇帝青睐。而孝标也以日讲、经筵等方式，对顺治帝接受汉文化起了一定作用。

同时，方拱乾面对清廷的一再征用，也再次出仕。拱乾曾任明朝詹事府少詹事、东宫讲官、经筵日讲官。他身受明朝国恩，却顶着压力出仕清朝，其因何在？盖因方拱乾长时间出仕明朝，亲历明末朝政的腐败和社会的危机，又目睹了满族这一富有勃勃生机的民族。以他务实的精神和深厚的经史修养，对清朝产生认同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方氏父子迅速认同清朝统治，受到一时宠眷。然而，由于方氏这一著姓望族，在江南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众多抵抗和隐逸的族人，令清廷耿耿于怀。在清初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竭力为清朝效劳的方氏父子，却突遭横祸。

二、桐城桂林方氏家族宁古塔之行程写实与复杂心态

顺治十四年(1657)，适逢乡试之年。给事中阴应节参劾：“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

……”[8]卷113,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癸亥顺治帝做出决定:

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拏来京……方拱乾著明白回奏[8]卷113,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癸亥。

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8]卷113,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乙亥。顺治四年及六年的《进士题名录》详细记载了方氏家族三代以内族人的姓名,以确凿的证据说明方拱乾与方犹“从未同宗”。所以,阴应节的参劾显系捕风捉影。

但清廷为整肃科场,震慑江南望族和士人,把南闱所有考官一律处死。包括方拱乾之子方章钺在内的七名被指控有舞弊情节的士子以及“曳白而出”的吴兆骞,“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8]卷121,顺治十五年十一月辛酉。这样,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三日,方拱乾率家眷数十口,与吴兆骞等人相携,自京师动身,七月十一日,抵达戍所宁古塔。从京师到山海关一段,对这些流人来说,堪称熟悉。接下来的从山海关到盛京(今辽宁沈阳)一段,沿线所经驿站有凉水站盛京站等十三站[11]卷33,623。但自盛京至宁古塔的驿道,山高林密,人烟稀少,方孝标的《东征杂咏》实录了从沈阳到宁古塔的几处险恶的路段。如对张伯火罗描述:“有山甚高峻,车必脱辐以绳缒之……”[10]卷7,100。然后是十八岭,孝标称“东行之苦以此为最。”[10]卷7,101方氏族人在这艰难的行程中,既考验了体质和意志,又如实记载了当时的境况。不仅使300多年后的我们读起来仍然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留下了当时东北地区自然生态方面的宝贵记录。

同时,这些诗作又是其情感的真实流露。方拱乾昔为前明官员,今为清朝罪臣。他看到决定明清两个政权命运的松锦之役的战场,不禁感慨万千。“前朝谙败绩,此地乃松山。一战倾明祚,千秋输汉关。”[12]8抵达沈阳,见到故人陈名夏之子陈心简,他赋诗以表同病相怜:“几年放逐为君悲,而我今来更过之”[12]11。陈名夏由于满汉矛盾以及朝中南北党争而被害,陈心简被流放沈阳。现在自己也遭此横祸。拱乾平和的心态逐渐失衡。随着步履北移,其诗温柔敦厚的色彩开始淡化,愤懑不平之情慢慢浮现出来,且看其《午日过年马河》:

信谗无一用,千古遂称冤。
何与蛟龙事,空劳舟楫喧。
命穷丝费续,天闭问无门。
转觉汨罗浅,临流未敢言。[12]12

在端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渡河,令他想起屈原,在诗中倾注了愤懑之情。经千辛万苦,方氏一家终于在七月十一日抵达宁古塔。这里在历史上有过两次辉煌时期,即“唐时的渤海文化以及金代时的金源文化两个时期”[13]。至清朝,宁古塔是战略要地,清人称其:“南瞻长白,北绕龙江,允边城之雄区,壮金汤之帝里”[14]卷2,12。顺治十年(1653)清廷在此设昂邦章京。但由于长期的战争,清初这里一度“弥望无庐舍,常行数日,不见一人”[15]236,经济文化极为落后。为加快开放,关内人民出关垦荒得到鼓励,同时相当数量的流人被遣戍至此。方氏族人及其他流人来此,带来先进的汉文化,势必促进当地文化的提升。

欧阳修所云“诗,殆穷者而后工也”,用在拱乾身上再恰当不过。坎坷的命运,艰苦的流放生活,使拱乾备尝艰辛,却令其以新的目光和心态观察思考这个陌生的地方,获得了作诗的新灵感。这正应了歌德那句名言:“现实必须提供诗的机缘和诗的材料。”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写下了《宁古塔杂诗》百首,其别样的滋味蕴于诗中,试举数则:

率土宁非地,王臣岂有冤?
愧无三字狱,空戴九重恩。[12]29

他抛开双关暗示,直抒胸臆,真气淋漓。他追慕王阳明的龙场悟道:认识到“是地即成土,何天不可居?”[12]18于是建屋三楹,名为“何陋居”。经过感情的爆发期之后,拱乾的心态复归平和,能随遇而安了。而且,他逐渐发现,在这个被人称为绝域的边荒之地,却是“侏离何处子,指此是中华……衣冠传自异,风土较来嘉”的独特场域,给他以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感受,因而写下了“益感君恩厚,投荒亦有涯”[12]21的诗句。因为日益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方拱乾开始对此处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深情。由于“心爱隔林花”,他就“短锄载牛车,宿土带花移。”[12]156。

总之,从出关到流放地,方拱乾的心态几经波动,颇为复杂。对清廷的离心与感激交织并存,对边疆文化和生活日益喜爱,进而获得对“大一统”的认同。

三、苦与乐——方氏族人在宁古塔的生活

拱乾父子来到宁古塔,能靠耕种官府田地为生。方拱乾有诗曰:

公田野囤分春种,黔突荒烟饱暮飧。
不到千山十死地,谁知一勺九重恩。[12]146

对这种力勤稼穑以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拱乾感慨颇深,吟出了“素餐六十年,白头乃食力”[12]156的诗句。

(一)诗以解忧

作为传统士人,方氏父子谋生之余,仍不废诗书。拱乾在横祸之下,在新环境中写出的诗,更真实地反映了其思想感情,更充满生命的体验,深刻揭示出清初流徙士人的心态。其诗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

彩。在发遣途中戍地，他作诗951首，结为《何陋居集》。归途、归后则有《苏庵集》，“得诗四百九十二首”。其中，《何陋居集》是黑龙江地区现存第一部诗集，其极高的文学价值自不待言，从史学角度看，唐朝龙泉府遗址、立于明朝的永宁寺碑、东北人民抗击沙俄的遗存及事件等等，都出现在这部诗集中。他对这片黑土地的历史、人文以及自然景物的观察和感悟，熔铸在了这些诗文里，留给了后人。

由于家族诗书传家的传统，又由于受方拱乾勤于创作，以诗歌为生命之所系的感染，方氏几乎人人作诗。拱乾长子孝标七岁学诗，初受七子、公安、竟陵影响较大。后得乃父点拨，专心学杜诗。后入官场，诗中多道学气和馆阁气。“及后迁谪、召还、出塞、入塞，加以称贷奔走，实无心著述，而不平之鸣与感物之绪尝不能已于心而禁于口。故近年所为诗文较昔转多，亦较昔稍进”[10]自序,8。政治上的失意反而使他深入生活，带来了诗歌创作的长进。次子亨咸工诗善画，书法亦为人称道。惜乎其作品多所散轶。三子育盛的《其旋堂诗集》，“述宁古塔风土甚备”。吴兆骞作序云：“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零”[16]卷8,499。其诗题材广泛，且抒幽愤之情。四子膏茂著有《方余斋集》，其中多数诗篇散轶。

(二)苦中读书

方氏父子几乎个个能诗，固然由于其言志抒情使然，同样是由其发奋读书、勤研经史决定的，其中饱含拱乾对后代不废诗书的谆谆教诲。拱乾三子育盛抵达流放地后，马上买一张书几，拱乾欣然题诗曰：

即次尚未安，先买读书几。
读汝途中诗，知未荒经史。
秋清场圃毕，高山多杞梓。
斧斤视厥力，构屋甘陋俟。[12]176

从诗中可知，尽管路途遥远、携带不便，方氏父子所带的经史和诸子等类书籍仍然十分可观。因为作为以科举入仕为人生旨归的士大夫家庭，读书乃是其最大的精神寄托和支柱。方氏如此，吴兆骞也不例外。据载，吴氏雇牛车所载图书有万卷之多。方氏读书作诗，并未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而是与吴兆骞等流人互为师友，给宁古塔文化留下了一段佳话。其唱和集《质鲞集》是黑龙江地区最早的多人诗集。方孝标对吴兆骞十分佩服，赋诗云：“可与言今古，边荒只有君。……幸将成败理，抉要与同闻。”[10]107方拱乾诗中记述了亨咸与吴兆骞易书而读的情景。诗云：“柴门开冻径，雪里送书童”[12]40拱乾本人与吴兆骞的唱和更是不胜枚举。所以，吴兆骞在写给在京好友的信中说：“龙眠父子，与弟同谪三年，情好殷挚，谈诗论史，每至夜分”[16]卷8,502。在写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也提到：“每啜糜之暇，辄与龙眠诸君子商榷(原书作“商确”)图史，酬唱诗歌，街谈巷曲，颇成一集。”[16]卷8,504可以说，方氏父子和吴兆骞是清朝被遣送到宁古塔的第一批流人中文化水准最高的，其中，方氏父子对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所起作用甚大，他们与吴兆骞的诗史交流成为流人文化交流的代表。正因为这一点，当顺治十八年十月，经过族人的纳赎，拱乾父子返回江南。而当地流人之间的文化交往陷入了低潮。用吴兆骞的话说，就是：“自彼南还，塞垣为之寂寞。”[16]卷8,502方氏在此地虽生活了短短三年时间，但其文化影响是永久的。方氏父子携书、读书、著书，与友朋互相交流心得，增加了当地的文化气氛。

以上略述的大量诗歌姑且不论，单就《绝域纪略》(又称《宁古塔志》)一书就足以名垂千古。拱乾亲历耳闻，以3200字撰述了宁古塔之得名，“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等[17]108-113，堪称黑龙江第一部风物志，为后人探寻牡丹江一带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比如：

关于佛教信仰。辽金时期，佛教在东北地区一度盛行，至明清之际已经衰落。拱乾记曰，“满人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至康熙初年“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西达子则知有佛有经，能膜拜，大约与哪嘛教同，与西土异仁。不祀神，惟知有关帝，亦无庙，近乃作一土龛”[17]112。可见，流人对佛教在当地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当地民风。“宁古之风，依然枝鹿之世，然中土礼义之邦所不及者有五：道不拾遗，一也。百里无裹粮，二也。不用银钱，以粟布交易，三也。蹦其田而罚其值，虽章京不免，四也。受所与，必思有以酬之，五也。有是五者，以臻无为之治，夫何愧焉？至敬礼中朝士大夫，尤为淳厚，良以士大夫迁谪者，声名文物，足当其起敬耳。”[17]113对当地人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满族葬俗。“死则以敝船为槨，三日而火。章京则以红缎旌之，拨什库则以红布，再下则红纸，俗贱红而贵白，以为红乃送终具也。”[17]112

书中有关婚丧，尤其是满族跳神和主神竿等记载，内容丰富、考证精核。曾为民国十三年(1924)修《宁安县志》时所引用。[18]105

尤为值得关注，方氏父子勤于著述，留下了黑龙江地区最早的诗集和方志，把遣戍途中及遣戍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记录下来，便利了内地人民了解边疆文化。同时，在《绝域纪略》和《钝斋诗选》中，反映满语汉译的“了深必拉”、“大阿稽”、“小阿稽”“多洪”[10]卷7,103-104等词汇不时可见，对研究满汉翻译颇具价值。

四、余论

由于清朝实现了国家“大一统”,使东北边疆地区成为与内地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清廷凭借政治权力,向东北遣戍大量流人。文化流人由此走出书斋,亲历“绝域”。力持“华夷之辩”的桐城桂林方氏家族,在明清鼎革之际,在遭遇科场案的冤屈之后,经历种种磨难和复杂的思想变化,逐渐与时俱进,放弃陈腐观念,最终获得对“大一统”的认同。在东北边疆,他们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并以文化“他者”的身份审视陌生新奇的文化,经过与中原文化的比较,获得了深刻的认识,笔录口传,为丰富并提升边疆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之际满汉民族磨合使方氏两度流放东北(第二次是因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桐城方氏被遣戍齐齐哈尔)。其族人勤于著述,《绝域纪略》、《龙沙纪略》、《卜魁风土记》,成为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

仅以方式济为例。他在卜魁谋生之余,杜门屏迹,与其父诗歌唱和,探讨经史。他还走向这片神奇而广阔的热土,拜访耆老,实地考察,结合存世文献,撰成《龙沙纪略》一书,以万余字详述黑龙江地区历史沿革、方隅山川、时令风俗、物产贡赋等,为一代名志,不仅入《四库全书》,更有人誉之为黑龙江文化之祖。

该书为私人撰述的黑龙江地区第一部方志。受到清人何秋涛的高度赞誉,称其:“事复语详,既足订辽金诸史之伪,并可补《盛京通志》之缺,是编,乃舆地家不可少之书。”[19]560“龙沙”二字,虽由来久矣。但自方氏济《龙沙纪略》之后始广为流传。

方氏虽两度蒙冤,方式济仍认同清朝“大一统”的合法性。“惟是卜魁可木之疆,北邻俄国,地处极边。古昔舆图,既虞疏漏,近时志乘,只据传闻”[19]560。他考察了两国边界,并记述了界碑的位置。[20]182

除东北边疆文化之外,方氏族人尚有多种记载其他边疆文化的著作传世。如方孝标的《滇黔纪行》、《滇黔纪闻》,方亨咸的《苗俗纪闻》,记录了西南地区的文化风俗;方观承的《从军杂记》对西北边陲的记载;方以智在两广等地“随野老问草木、方言。”[21]卷8,317的记述等,都有待学者探究。

[注　释]

① 清代“大一统”理论主要成果有:李治亭,《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社会科学辑刊》2006 年第 3 期;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刘晓东,《“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杨念群,《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② 代表性论著有:李兴盛,《东北流人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马,《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李德新,《清前期东北流人研究(1644－1795)》.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③ 代表性论著有:李兴盛,《＜南山集＞文字狱案及桐城方氏向东北的遣戍》,《北方文物》1988 年第 2 期;麻守中,《清初桐城方氏两次遣戍东北考》,《史学集刊》1984 年第 4 期;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参考文献]

[1] 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 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M].光绪十四年刊本.

[5]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 黄君坦,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6] 梁实秋.梁实秋怀人丛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7] 高阳.明末四公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8] 清世祖实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方孝标.方孝标文集[M]. 郭春萍,石钟扬,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7.

[10] 方孝标.钝斋诗选[M]. 唐根生,李永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6.

[11] 阿桂,等.盛京通志[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12] 方拱乾.方拱乾诗集[M]. 李兴盛,整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13] 曹志.黑龙江文化的振兴与清代“流人”的贡献[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1).

[14] 萨英额.吉林外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李兴盛.宁古塔历史文化[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16] 吴兆骞.秋笳集[M]//李兴盛.黑水丛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7] 方拱乾.绝域纪略[M].李兴盛,张杰,点校,黑龙江述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18] 马丽.清代东北流人方志文献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9] 何秋涛.重刊龙沙纪略序[M]//柳成栋.东北方志序跋辑录.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

[20] 方式济.龙沙纪略;龙江三纪[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1]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续修四库全书第 1398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学术编辑　黄彦震]
[责任编辑　朱毅然]